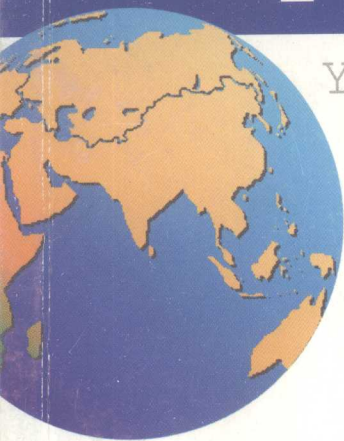


同 济 亚 太 研 究 论 丛

蔡建国◇主编

1

亚太地区 与中日关系



Yataidiqu yu Zhongri Guanxi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同济亚太研究论丛

蔡建国◇主编

1

亚太地区 与中日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蔡建国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同济亚太研究论丛)
ISBN 7-80681-046-3

I. 亚... II. 亚... III. ①政治—亚太地区—国际学
术会议—文集 ②中日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730.0-53②D822.3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738 号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

主 编: 蔡建国

责任编辑: 常 工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ISBN 7-80681-046-3/Z·001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同济大学校长 吴启迪

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建立已届周岁。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研究中心的主持者蔡建国教授全心投入,身体力行,联络和团结了一批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并积极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同济亚太研究论丛》形式,陆续出版。对此,我十分赞赏和支持。

同济大学建立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背景:第一,是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济大学在新世纪里正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现代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努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求学校的学科门类和专业设置必须更为齐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必须同时增强。第二,是学校加强对学生素质教育的需要。而学生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知识素质、技能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的提高,人文科学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相反,科学的人文知识,对学生的思想影响和世界观看的正确形成,更为直接和重要。所以,学校在保持理工优势学科之外,加强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建立就是其中之一项。

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也是一个世界大国。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正在亚洲和世界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

快。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意识,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具有世界优秀文化的鉴别能力和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能力。这些要求正是促使我校设置国际政治专业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亚太研究中心建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深信,《同济亚太研究论丛》的出版,不仅对同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教育是一种支持,也是对其他专业的学生扩大国际视野和增加国际知识的一种支持行动。因此,我要向所有《同济亚太研究论丛》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祝愿《同济亚太研究论丛》受到读者欢迎。

2002年4月22日于同济园

前 言

《同济亚太研究论丛》是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性论著。它作为同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出版物之一,提倡以科学的立场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理性地观察世界,客观地分析国际和地区间的敏感问题,在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国际关系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研究的基础上,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

同济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近几年来学校_在发挥传统学科优势的同时,注重发展文科,以期提高学生的综合知识结构及国际化意识,努力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创造校园浓厚的人文氛围。鉴于此种构想,于 2001 年 5 月 25 日成立了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以来在校领导的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努力工作,与时俱进,坚持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并行的方针,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学校的文科学科建设和繁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同济亚太研究论丛》的创刊就是这一年来的成果之一。

当今世界复杂多变,学者如何在这纷繁的国际形势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的研究,这是我们的_{重要}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团结和联络广大校内外专家一起来耕耘和开拓。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汲取边缘学科、自然科学

的研究手段、方法和成果,争取理论创新。我们要加强同国内外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最大限度地追踪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术界的先进知识和研究成果,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同济亚太研究论丛》第一辑《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是我们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于2001年9月联合召开的《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进入新的世纪,中日两国各自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而且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目前的两国关系,(也对新形势)中日两国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那次研讨会上,来自中日两国的一百多位学者在“政治与外交”、“经济与合作”、“文化与交流”三个专题中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在当时中日关系由于“李登辉访日”、“教科书问题”、“由农产品引起的经济摩擦”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而出现低谷的状况下,与会者从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以理性的态度审视两国关系,通过热烈的讨论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收获。我们在研讨会论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这一辑《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书中收集了中日两国22位学者的论文,可以说是近半年多来我们研究中日关系的最新成果。今后我们每年将出版一至二辑。我们热切地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来关心和爱护《同济亚太研究论丛》这一国际问题研究的小苗,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高见,展开讨论,为繁荣国际问题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我们的努力。

蔡建国

2002年4月

目 录

序/吴启迪(1)

前言/蔡建国(1)

第一部分 政治与外交

日中关系 160 年/山田辰雄(3)

东亚发展与中日关系/俞新天(10)

迎来新世纪的世界形势与中日关系/藤野文晤(18)

为了新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郭焰烈(25)

——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陈鸿斌(33)

“21 世纪首场战争”与日中美之间的关系/福原亨一(40)

论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的两面性/王少普(60)

从历史教科书看中日关系史/赵 军(76)

是什么在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历史? /王智新(99)

第二部分 经济与合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解决中日贸易摩擦的途径/傅钧文(117)

——以中日纺织品贸易摩擦为中心

-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日中经济/藤村幸义(131)
——日趋激烈的轿车市场
日本式金融体系的特征及其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戴晓芙(144)
——解析日本的主银行体系
资产证券化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体制的确立/大久保薰(165)
强化科技兴国 重铸日本辉煌/李秀石(181)
中日经贸应从大局出发着眼未来/马世侠(202)

第三部分 文化与交流

- 关于东亚近代化/依田熹家(211)
——国际关系及其与西洋文化的接触
留日学人与华侨华人社会/陈昌福(228)
派遣与接纳留学生的理念和事实/赵建民(248)
——中日关系史上三次留学高潮的回顾和思考
中国留学人才采用体系和日本的定位/远藤誉(263)
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课题/陈永明(274)
大众传媒的现状与课题/川村范行(279)
——日本特派员见到的中、日新闻报道的区别
试论近代中日关系中的人际关系/俞慰刚(287)
——以戴季陶与日人交往的言行为中心

第一部分

政治与外交

日中关系 160 年

日本放送大学 山田辰雄

自 1972 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邦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发展,至今已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但是,在此期间两国间发生的种种对立状况也是事实。一旦处理有误,就有损害两国关系的危险性。在日中关系中,曾有教科书、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双方对军费增加而扩大的互不信任、贸易收支不平衡、光华寮、日本内阁成员对日中战争的评价等问题。最近几年还因日本国会所作的对过去战争的决议、日本对中国核试验的警惕和抵制等引发的。到了 2001 年,又出现了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访日、日本对中国农产品设定“紧急限制”和中国对此报复等问题。

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双方都希望采用的妥协的努力得到解决。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列举的许多状况,都是与过去日中战争的历史认识相关而政治化了的问题,这些问题,虽因两国政治层面的努力而暂时平息,但由于这种反复出现的对立,导致日本国内对近代日中关系看法的对立的进一步扩大。就日本而言,一方面强调日中战争中日本的侵略性,另一方面却否定日本过去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并从亚洲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日本的战争是为了从欧美帝国主义控制下解放亚洲各国的主张。

日中双方都在提倡发展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但是,在上述

反复出现的对立中是很难实现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不使这种对立转化为敌对的冲突,为此,要建立日中双方都能相互理解的日中关系史构架。这里,我想在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历史的角度简要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关于日中关系的时代划分

关于如何划分近代日中关系的起点,学术界有几种观点。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1931年的“9·18事变”、1915年的“日本对华21条要求”,还可以上溯到1894年的“日中甲午战争”。这几种观点的共同点,是把近代日中关系史看作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从上述亚洲主义的逻辑出发,隐瞒日中战争日本的侵略意图的做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我认为,在近代日中关系中,同样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日中关系的起点,应该追溯到160年前的江户末期、明治初期和清朝末期。这样,或许可以较为全面地来认识日中关系。

从以上的观点出发,近代日中关系史的第一时期是19世纪中叶江户末期、明治初期和清朝末期,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1895年的日中甲午战争。这个时期是欧美列强介入东亚国际关系的时期。这对日中关系提出了新问题,即如何对待欧美文明,以及如何借以改变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中两国互相依存的一个侧面。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反映近代中国洋务思想的先驱性著作,自1842年传入日本后,当时日本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将其作为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最好读物而予以接受。此外,《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58年)中的最早的著作是《增订英华通语》,此文是福泽谕吉于万延元年(1860年)在旧金山买到的中英辞

典附上发音翻译成日语的。这些情况,从日中关系史的角度看,有两个象征性意义:第一,日中的文化交流通过美国而形成;第二,在日中文化交流中,连革命的欧化主义者福泽谕吉也是通过中国来学习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的。这说明了 19 世纪中叶日本输入欧美文明时,中国的一部分先进的近代思想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第二个时期,是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时代。以甲午战争为起点,日本开始侵略中国。虽然战争本身是因日中之间围绕控制朝鲜半岛的争议而起,但在其背后存在着日本向大陆扩张势力的明显意图。这样,日本时而主动参与围绕中国列强的权力政治,时而被动地卷入其中,最后日本终于与国民革命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冲突。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辛亥革命期间日中之间的特殊关系。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都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家在日本的活动、日本志士对中国革命的支援等事实,不胜枚举。我认为,由于辛亥革命是产生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从日中关系史的观点出发,对此也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第三个时期,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 40 年代中期的日中战争。这个时期的问题是引发今天日中之间最多的政治对立的因素,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自 1972 年以来的多届日本政府,乃至现在的天皇也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了这个事实。

与此同时,除了战争过程本身,对日本国内在战争爆发的政治决策过程和战争的非人道层面的分析也很有必要。因此也存在着如反战运动、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战争不扩大派、和平运动等等选择。问题是要弄清在有这些多样选择的情况下,为什么、又是经过怎样的过程,最终却导致了战争的。这不仅对当时,就是对认识今天的日中两国关系也有重要意义。另外,区别

战争进行过程中政府与民众的看法也应该更加全面,领导战争的确实是政府,但日本媒体对民众的诱导,是否也构成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呢?在这种状况下,必须明确大众传媒的作用和责任。

第四个时期,是1945年日本战败至当代的日中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开始、强化、崩溃过程中,日本经过了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缔结关系,到1972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政策的重大转换。从日本方面看,在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同时,如何应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对立,是经常讨论的重要问题。反过来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来说,如何与日本交往,也是一个课题。这种状况,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存在,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焦点。直到今天,这种结构依然没有变化。

二、日中关系中相互依存、竞存、敌对的状况

第二种视角是从多方面看日中关系。正如我已经谈到的那样,日中关系的历史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层面构成的。这就是相互依存、竞存、敌对的关系。

今天的日中关系,也证实了日益高涨的两国相互依存度。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增加,两国基本维持着稳定的关系。对日中两国而言,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地牺牲这种关系的。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种相互依存的情况。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诞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许多中国的革命家活跃于日本,日本的官民志士支援了他们。日本是辛亥革命重要的基地,没有

日本的协助,这次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其时间可能会推迟。正由于此,这一时期的日中两国的相互关系很重要。因此,辛亥革命在日中关系史上的意义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再则,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许多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接触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欧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彭湃等都是留学日本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同时,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也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如果再联系到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通过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而形成的日中相互依存关系也见其重要性。这又揭示了日中两国文化交流有时是以西欧文化为媒介的这一事实。

以上是近代日中关系相互依存的几个例子,当然,这种关系中也经常包含着竞争与对立的要素。对于在一定范围而又不发展为敌对状态下的竞争与对立,我把这种情况叫做“竞存”。

日本与中国作为亚洲的强有力的国家,经常处于竞争关系之中。即使在今天,这种状况还没有改变。两国在政治、经济,有时在军事方面也存在竞争,这种竞争有时会造成对立,但在今天,两国、乃至多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还未发展到敌对状态以前则是稳定的。日中两国的这种竞存关系,也可以追溯到近代。

孙中山受到日本朝野的支持,但有时也遭遇日本政府对革命运动的强烈戒心和阻碍。他于 1924 年 11 月 28 日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在神户作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那是基于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推行霸道之际,劝说日本回到和平道德的王道。其指导思想则是西方的武力与东方的道德的对比。这场讲演是孙中山在协助关系将要转变为敌对关系之时进行的。

竞存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转化为敌对关系。敌对的

情况,典型的就是以战争和侵略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敌对的状况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可能性。两国恢复邦交前,在冷战的敌对过程中,日中民间的友好运动仍在进行,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在考虑日中关系时,既要在相互依存和竞存的状态下发现转向敌对的萌芽,以便早日解决;同时,又应在敌对的状况下探寻相互依存的可能性。

三、在日中两国关系中必须注意其他多种因素

我们分析日中关系的第三种角度,不是将日中关系限定于两国间关系,而必须注意其他多种因素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两国间发生问题时,我们往往把它限定在两国间,并扩大感情因素来加以分析。冷战下的美中对立确实是早期阻碍日中邦交恢复的要害,这种状况今天也没有改变。日本国内有一部分人确实希望建立不受美国影响的日中关系,这样就必须构筑不依赖美国的、独立的经济、安全保障体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日中关系还是不得不紧紧地跟着美中关系联动。近年来大陆、台湾之间由于军事紧张而造成的日美安全保障的再定义,显示了这个角度审视日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同样,日中战争的胜负之争也不是只由两国间决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多国间的战争,中国的抗战对日本的战败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欧美战局的变化、苏联的参战、美国在日本战败中所起的作用,也都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结果。

如前所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日中文化交流,是通过欧美为中介的。应该注意的是,采用这一方式而出现的日中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变化。转变点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当时康